

柳无忌的海洋文学理论

陈绪石

内容提要 在中国近代国家转型的背景下，一批知识人踊跃建构海洋学术，译介并研究欧美海洋文学。柳无忌的专业学养和学术兴趣使其在海洋文学理论的建构上有过人之处。柳无忌以题材界定海洋文学，并主要以英美海洋文学作品为材料论析海洋美学；他倡导海洋文学运动，主张以海洋写作推动中国文学创新、以海洋文学推进民国的海洋国家建设。他的海洋文学理论是国家文学理论，是20世纪40年代民族文学思想的一部分。柳无忌自觉地阐释海洋文学的重要问题，这标志着在中国文论史上海洋文学理论的形成，他的理论是民国海洋文论的高峰。

关键词 柳无忌；海洋文学理论；国家文学

在民国时期，大量英美海洋文学作品输入中国，海洋文学评论随之涌现。在文论史上，首次对海洋文学作专门研究的学者是柳无忌，他发表了专论《海洋文学论》，翻译了康拉德的小说《阿尔麦耶底愚蠢》（上海古今出版社1943年版），并写有《海洋小说家康拉德——〈阿尔麦耶底愚蠢〉的绪言》。海洋文学研究在当下是热点，但是，研究民国海洋文论的论文、著作极为少见，柳无忌的海洋文学理论也甚少被学者纳入研究视野，只有王伟在略述民国海洋文学时对它们作了简论，他指出，柳无忌“在‘国家文学’的大框架下来提倡海洋文学”^[1]，该论断切中柳无忌文论的实质。但学界尚未论析柳无忌海洋文学理论的产生原因，也不曾深入地论述其理论的主要内容，或阐明其理论在海洋文论史上的意义。这几个问题是研究的要点。

一 柳无忌海洋文学理论的产生

近代中国出现向海洋发展的大变局，在此变局下，知识人积极建构海洋学术文化，这是柳无忌海洋文学理论产生的背景和语境。

古代中国重陆轻海，而近代中国被迫视海洋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一翼。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也濒临太平洋，但是在古代并未积极向海上扩张。“‘中

国’一词的概念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由单指位于洛邑的‘国中’，扩大为主要指‘中原王朝’，即华夏民族所居住的黄淮江汉的共同地域，最后才延伸为指以中原为核心的历代封建王朝，近代以来，已完全演变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称谓。”^[2]这意味着，古代中国由一个个有中原向心力的王朝组成，任何王朝若以华夏自称，必然“逐鹿中原”，因此，一些学者如梁启超认为，“我国大陆国也”^[3]。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面海的国家，除了东南沿海的民间有活跃的海洋活动外，有的王朝相对而言也较为倚重海洋，如两宋推行海洋贸易政策。但是，有学者认为：“中国失去近代化的机遇，其实并不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以后海洋战略的趋于保守，而是早在宋代经济发展居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的时候，就已经失去向海洋发展的大好时机了。因为有宋一代缺乏向海洋发展的思想动力。”^[4]该文的意思是，囿于皇权制度和大陆自然农耕经济，士大夫没有动力为国家的海上拓展创造新思想，宋朝因而丧失转型时机，不曾脱离大陆国家轨道。明清王朝对内经常执行海禁政策，所实行的朝贡贸易外交则展现“天朝上国”风范。迥异于对古代中国的判断，在《20世纪太平洋歌》中，梁启超以为自古希腊以来活跃在海上的西方国家是海洋国家，其“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之说的学理是西方的

人文地理学,该学说有其合理性,在晚清民国学界的影响也很大。西方国家近代的海外扩张改变了中国固守东亚大陆的历史,重陆轻海的中国被迫进入试图向海洋发展的时期。李鸿章所言的“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5],在19世纪40年代拉开大幕,清朝惨败于海上帝国英吉利之后,魏源就有学习西方海国的想法,编纂了《海国图志》,不过,真正驱使近代中国全面学习西方海洋国家的事件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长期以来,日本是一个以农业为立国基础的岛国,但在近代它彻底转向西方,经明治维新之后变身为注重向海外扩张的工商业国家。日本击败大清,刺激了王朝部分权贵和士大夫,再加上马汉的《海权论》在1900年前后传入中国,使晚清民国知识分子形成了借鉴日本维新经验、建设中国为海洋国家的理念,在《新民丛报》《东方杂志》《海军杂志》等期刊上热议海权、海军、海洋实业等话题,试图建构海洋学术。在讨论如何将近代中国打造为海洋国家的背景下,士大夫首次得以在海洋领域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如左宗棠、李鸿章、盛宣怀等为晚清朝廷踊跃谋划海洋事务,试图推动大清王朝向海洋国家转型。民国政府也有积极经略海洋的意图,但由于战争是常态,民国一如晚清,并没有成功地转型为海洋国家。

在一个向海洋国家学习的时代,欧美海洋文学作品被大量地引进中国,民国文人借鉴欧美海洋文学批评,研究海洋文学。域外海洋文学作品译介的起点在晚清民初,美日法德等国家均有作品传入,英国作家的作品尤为译者所喜爱,以康拉德为例,他有《青春》《吉姆爷》《黑水手》等6本海洋小说被翻译出版。1924年,康拉德去世,文学研究会关注这一事件,其成员发表了《新近逝世的海洋文学家》(从予《东方杂志》第21卷第15期)、《新近去世的海洋文学家——康拉特》(诵虞《文学》第134期)、《康拉特评传:纪念这个新死的英国大作家而作》(樊仲云《小说月报》第15卷第10期)等文章。这些作者将康拉德定性为海洋作家,阐述海洋文学问题,为以后的康拉德研究确立了路向。海洋文学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长期缺席,民国文人在批评域外作家时,该概念开始进入文学

场,有意识的海洋文学评论开始出现。海洋文学研究的源头在欧美,比如,1897年康拉德的《“水仙号”的黑水手》发表后,“早期的评论家大都肯定该小说是一部优秀的海洋小说”^[6],再如,在康拉德之前,像英国的斯摩莱特、拜伦和美国的库伯、麦尔维尔等,在欧美学界就被称为海洋作家。当民国文人综评康拉德以及其他书写海洋的欧美作家时,他们参照了域外海洋文学研究资料,这也是由于他们有接受西方文论的条件。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开设英国文学课程,毕业于该校的曾虚白是著名的英国文学研究者,在国外留学的学生如柳无忌更是有专业学养。况且,大量的英美文学研究译作在民国时期出版,著述内不乏对海洋文学的论述。这充分说明,作为术语和文学类型,“海洋文学”不是民国文人新创的,他们的海洋文学批评和理论建构有外来学术资源。

在康拉德等域外作家的译介中,民国文人开始论说海洋文学,但海洋文论的产生未必与国家向海洋转型的背景有显见关联。文学研究会热衷于域外文学的翻译,1920年《小说月报》的《小说新潮栏宣言》指出译介的目的是推动中国文学创新,在《文学旬刊》创刊时,编辑部发表宣言:“在此寂寞的文学墟坟中,我们愿意加入当代作者译者之林,为中国文学的再生而奋斗,一面努力介绍世界文学到中国,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文学,以贡献于世界的文学界中。”^[7]文学研究会成员在推介康拉德等作家时,并没有将海洋文学写作、评论与国家向海洋的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不过,由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观着眼于现实人生和社会,具有强烈的功利性,所以,完全否认它的海洋文学讨论与当时的海洋学术和国家转型之间的关系也不现实,应该说二者有间接或隐性的联系。

直接催生海洋文论的建构的,是国家对海洋的重视和文化界的海权讨论,这发生在抗战时期。日本侵华使中国的海权完全丧失,国家失去朝海洋拓展的机会,但中国需要向海而兴已是共识,与海洋国家身份相匹配的海洋文学成为一个关注点,在当时积极刊发海洋文学作品和论文的报刊有《中央日报》《海军建设》《长风文艺》等,其中《海军建设》的影响最大。它是海军建设促进会主办的同人

刊物,从刊发的文章看,海权、海军、太平洋等是关键词,这表明助力海军建设、促使中国获取海权并成为强大海洋国家是其办刊宗旨。在基于国家转型需要而建构的海洋学术语境中,“研究海军的几个朋友,最近颇有志于提倡海洋文学”^[8],理论建构呼之欲出,数篇海洋文学论文出现在刊物上。专门就海洋文学阐发见解,柳无忌是后来者,其《海洋文学论》刊发在1942年的《海军建设》第12期上。时代因素制约了他的海洋文学理论建构,但与此前以及后来的许多作者相比,他对海洋文学的思考更为全面、深入,所以,研究柳无忌海洋文学理论的产生,还要论述他本人的主观因素。

柳无忌建构海洋文学理论,以他的专业学养为基础。柳无忌留学美国,“1931年得耶鲁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学位”^[9]。英国是海上国家,自古以来英国作家就有书写海洋的传统。盎格鲁-撒克逊人有海洋史诗《贝奥武甫》,主人公手持利刃潜入深渊与恶兽搏斗,非常勇武;近代以来,大英帝国积极实施海外扩张和海洋贸易政策,冒险、契约和理性的国家精神得以形成,丰富的海洋故事和渗入生活的海洋精神成为作家表达的内容,重要的海洋作家有柯勒律治、斯摩拉特、康拉德等。除海洋文学创作外,英国海洋文学传统还体现在研究方面,如近代英国学人解读过17、18世纪的航海叙事,这是一种非虚构文本,再如许多书写海洋的作家被学界称为海洋文学家。柳无忌品读了大量英美海洋文学作品,在《海洋文学论》里,柯勒律治、笛福、斯摩拉特等人的作品均进入他的研究视野。此外他也阅读了不少英语海洋文论文献。柳无忌留学回国后曾在多所大学担任英国文学的教学工作,在研究和教学中他难免参照海洋文学研究文献。比如,他翻译了一本美国学者撰写的《英国文学史》,著作者阐述英国古老的文学源头,认为:“富有冒险性的航海生活,往往是诗人灵感的来源。”^[10]尽管这本教材出版于1947年,不过译者柳无忌在序言里说,在教授英国文学时,他多年以来就使用该书的英文版本,这说明他早就接触过英美的海洋文学研究文献。研究海洋文学、建构海洋文学理论是其专业工作的一部分,他在多篇文章里论述过书写海洋的作家作品,但专门的海洋文学研究论文只有两篇。

柳无忌是一个热爱海洋的人,他研究海洋文学也是其兴趣使然。柳无忌1907年出生于苏州吴江,小学就读于本地,后入上海圣约翰中学就读,是江南文化孕育的文化人。宋明以来江南工商业发达,经济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与西来的域外文化有一定联系,所以,有学者以为:“江南文化虽不是典型的海洋文化,但濒海而起、依海而兴的历史传统,使之呈现出诸多不同于内陆文化的文明特质和属性,走了一条颇具特色的发展道路。”^[11]江南文化具有海洋特性,在江南地域成长的柳无忌,骨子里有喜欢海洋的文化基因。“无忌舅舅爱大海。光南表妹常陪同他到海边去,观看海浪奔腾,聆听波涛拍岸。”^[12]在美国,晚年的柳无忌依然保持了对大海的喜爱,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他早年阅读大量海洋文学作品,进而讨论海洋文学问题,也是出于兴趣,与他热爱海洋的情怀不无关联。

二 柳无忌海洋文学理论的内容、实质

柳无忌的专业学养和学术兴趣,确保了其文论建构的理论水平。在《海洋文学论》里,他建构了有时代特色的海洋文学理论。

柳无忌从国家角度建构海洋文学理论,他认为,新国家、新时代,需要海洋文学运动。像许多民国文人一样,他指出,自古以来中国几乎没有海洋文学作品,而目前中国已进入新时代,新兴的中国需要新的文学,理由是:“文学是时代的鉴镜,处在这大时代中文学势必与之相互呼应,呈现着蓬勃的朝气,一方面顺随时代的潮流共同前进,另一方面,更进而积极地指导人生,创造出新的前进的思想以改造时代。”^[13]柳无忌并没有对他所说的时代作出阐释,从文章里推断,这就是国家从重陆轻海向经略海洋的转型。柳无忌倡导海洋文学运动,顺应中国的发展需求,主张“从文学作品中给与读者一种‘海洋的意识’,使人们切实地认识海洋,爱好海洋,因对于海洋发生兴趣而从事于航海的工作,以及海防的爱国工作”^[14]。海洋文学作品在“指导人生”中的意义是,让长期固守在大陆的多数中国人有海洋意识,热爱海洋,勇于征服重洋

大海；“改造时代”意指通过海洋文学的宣传，让国民乐于在海洋上工作，从而推进中国的海洋国家建设。

柳无忌还从文学角度谈论了提倡海洋文学运动的必要性。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的海洋文学是贫乏的，但作为文学题材，海洋是如此丰富：首先，海洋是一个巨大的生物圈；其次，海洋富有魅力，有浩荡、雄壮、多变幻的景致；再次，古代人望洋而产生了奇幻想象；此外，海洋民族（海岛居民）在海上有特别的人生；最后，海国人民对海洋有着国家主义情怀。而且，“文学也急切地需要一种新的刺激，一种雄壮的浩荡的精神，一种唯有从海洋中始能获得的写作灵感”^[15]。海洋在文学写作中的意义有二，它是题材也是精神，它是亟待于表达的新内容，能够推动中国文学的创新。需要说明的是，柳无忌的海洋文学论述总是着眼于国家文学的建设，“在复兴时期的中国文学应当开拓着新的世界，在海洋上，以及其他的地方”^[16]。国家力图通过海上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走向海洋的新创文学，就是符合国家需要的新文学。

柳无忌在《海洋文学论》中就海洋文学的概念、美学、主题等作了论析，其中有可圈可点之处，也不乏谬见。他认为：“海洋文学的意义很简单，它包含着一切以海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如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17]由于他从题材角度定义海洋文学，所以，柳无忌注重海洋题材的分类、罗列，并举例论述各种海洋题材，重点分析作品和作家。以海洋为题材的文学就是海洋文学，这显然不是严格的学术概念阐释，也不具有科学性，不过，在论析各种海洋题材的作品时柳无忌对海洋美学的论述很充分，他以浩荡、雄壮、敬畏、严厉、神秘等词语概括文学作品中海洋的美学特征，美学上的阐述弥补了概念界定上的缺陷。如果作品属于海洋文学的必要条件仅为题材，那么，这就不是文学上的界定，因为审美是文学的本质。将论述的重心放在作品的美学分析上，就意味着海洋文学作品必须具有海洋的美学特质，这有效地避免了海洋文学概念的泛化，没有美学价值的航海日志、海洋记录甚至包括部分海上故事等都不能是海洋文学作品。柳无忌还阐述了部分海洋文学作品的主题，迄今看来，其所述仍

有意义。英国的航海小说是柳无忌解读的一个重点，他提及的英国作家有笛福、斯蒂文森、康拉德等，康拉德小说里海员同舟共济、忠于职守的精神为柳无忌所赞赏，此外，他还说：“尚有许多诗歌，歌唱英国海上的霸权，以激起爱国的热忱。”^[18]柳无忌羡慕英国获取海洋霸权，更欣赏诗歌所宣扬的海国民族搏击风浪的英勇精神，认为这是国家文学所亟需的精神。

1943年，柳无忌翻译的《阿尔麦耶底愚蠢》出版，他写有《海洋小说家康拉德——〈阿尔麦耶底愚蠢〉的绪言》，这是一篇海洋作家康拉德的批评论文。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将康拉德置于英国海洋文学传统中读解，是该文的显著特点。首先，柳无忌阐述英国海洋文学传统，指出英国是岛国，英国人是航海民族，自古老的《贝奥武甫》始，海洋就是英国文学的宝库、情感表达的源泉。其次，他讲述了波兰人康拉德如何成为英国的海洋作家。康拉德在小时候阅读过英美海洋作家的海洋文学作品，立志做水手，后来终于在英国商船上成为水手乃至船长，而且学习了英语，加入英国籍。他在海上航行二十年，有丰富的海上和海外经历，第一部小说《阿尔麦耶的愚蠢》于1894年出版，其后他在英国专职写作，有大量海洋文学作品问世。最后，柳无忌论述了康拉德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柳无忌看来，康拉德是一位纯粹的文学家，深刻地理解、同情英国的民族性，但在内心深处他又是斯拉夫民族的；康拉德继承了英国文学传统，又是伟大开拓者，他的海洋小说是有现实意味的海洋传奇，他是英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海洋作家。

1945年，柳无忌定居美国，后来未研究海洋文学，仅有的两篇论文有其共性，他的海洋文学理论是国家文学理论，有合理性，也有偏激之见。从柳无忌的文论看，尽管他不忽视作家的特殊性，但仍将作家作品提升至国家层面加以论述。《海洋文学论》是一篇专门从国家角度研究海洋文学的论文，新的中国必须拥有海洋文学是该文的核心观点；在《海洋小说家康拉德——〈阿尔麦耶底愚蠢〉的绪言》中，论述的一个落脚点是“大英帝国的海洋文学传统，这种传统源自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海上生活，而海洋文学又深刻地塑造了该民族的心

灵。这种将海洋文学置于国家视角下的论述有合理的一面。首先,从理论产生的时间点看,柳无忌的海洋文学研究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人占领中国海岛、封锁海岸线,中国的海权彻底沦陷,对于中国来说,国家层面的海洋文学宣传、译介、研究能唤醒国民的斗志,力助国家获得海权。其次,柳无忌的海洋文学论涉及国家形象的塑造,是有价值的论述。在前几年的一次海洋文学国际学术会议上,“海洋文学与国家型构关系,是与会专家学者十分关注的另一议题”^[19]。这说明,海洋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国家形象的建构,阅读了大量英美海洋文学作品的柳无忌当然了解这种历史状况,所以,基于民国向海洋发展的渴求,他提倡中国的海洋文学运动,他的理论吻合国家建设的需要。不过柳无忌的海洋文学理论也有偏激之处。其一,他片面夸大海洋文学在国家身份建构上的功能。他以为:“因为没有海洋文学,所以这些勤俭耐劳的海员在异国的海轮上工作着,所以这些在中国海中星罗密布的岛屿已沦入他国的掌握中,所以在战争时期不但失去了海上的霸权,而且绵长曲折的海岸线也都紧紧地为敌人封锁,随着几个港口与商埠的相继陷落。”^[20]因为没有海洋文学,中国失去了海权,也就不是海洋国家,这是本末倒置的论调。海洋文学虽有价值,但在海洋国家建设中仅起到辅助作用,海权需要政府和国民去力争,中国国家身份的重塑主要取决于海洋硬实力的不断加强。其二,他的海洋文学理论建立在英国海洋作家作品的基础上,是海洋扩张型理论,对中国而言不切实际。他以英国的文学作品为范本,所倡导的海洋文学是具有海洋帝国色彩的文学,海洋扩张超越了民国的实际国力,他以理论形塑国家身份的努力,最终的作用不大。因此,海洋文学理论的建构,还要兼顾本土。柳无忌一再强调海洋文学作品在中国极为罕见,唯一被他纳入视野加以论析的是木华的《海赋》,他认为该文的长处是海洋描写,但文字语句已没有生命力。其实,古代中国有大量海洋文学作品,它们往往展现了国人对海洋的敬畏、传达了国民与海洋和谐相处的理念,若将这些作品纳入视野,柳无忌的理论将获得中国文化底蕴,而且,兼容中西的理论也不至于脱离民国的现实。

柳无忌的海洋文学理论是20世纪40年代民族文学思想的一部分。抗战期间,国人的民族救亡意识高涨,海军建设运动的开展和海洋文学的提倡是时代大潮中的支流。海军建设促进会高举“海军建设运动的大旗”^[21],意在复兴民族和抗击日本,发表在《海军建设》上的海洋文学作品和论文大都具有浓郁的民族主义色彩。40年代的柳无忌是一位民族主义学者,他的《民族文学的建设及其理论》被刊发在1941年的《星期评论》上,后来柳无忌将它收入著作《明日的文学》(桂林建文书店1943年版),并更名为《国家文学的建设及其理论》,用“国家”替换“民族”,柳无忌以为二者的含义基本一致;在《海洋文学论》中,他继续从国家角度阐释海洋文学。如果说,陈铨与“战国策派”知识分子“在民族复兴之路的寻找中,发现了让一个‘落后’民族、‘后发达’国家强势崛起的精神资源,这就是尼采学说与德意志经验”^[22],那么,柳无忌和海军建设促进会同人则认可英美等国家以海强国的经验,所以,他倡导海洋文学运动,以国家或民族利益为核心建构海洋文学理论。在民族文学思想中,柳无忌的海洋文学理论有着较为重要的价值,因为沿海国家的主权、国土与综合国力与海洋都有密切关联,国家向海洋进发是必然大势。

三 柳无忌海洋文学理论的文论史意义

综观民国时期议论海洋文学的文献,有作家作品评介、海洋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文学史阐述中的海洋文学论等三种类型。在搜寻、查阅晚清民国报刊著作里的文论文献后,笔者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中国学界的海洋文学讨论应该不早于20世纪20年代,或许在此前偶有推介海洋文学的文章,但在文学界,有较大影响的海洋文学研究确实从1924年的康拉德评论开始。后来,理论建构的文章逐渐出现。国内的欧美文学史类著述始自20世纪20年代,30和40年代是论文刊发和著作出版的喷发期,提及海洋作家作品的文学史著述虽多,从文学理论角度看,却存在一些问题。文学史里的海洋文学论述有片段性的特点,比如,在有的文学史里,库伯是美国著名海洋小说家,“《领港者》(Pilot)是美

国首出的而且是最好的一本海洋小说”^[23]，柳无忌则在文学史论文《现代英国小说的趋势》里看好康拉德，指出“他的海洋小说有永远的价值”^[24]，但各位学者在文学史著作（论文）里未就这些观点展开充分的分析，述略是文学史写作的常态，阐述的文字从数十到数百不等，简短的海洋文学讲述被淹没在文学史长河里。因此，就海洋文学理论建构而言，文学史里的海洋文学论述没有多大价值，况且，文学史著述有不少是译作，非民国文人撰写。

民国报刊里的海洋文学评论，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基本上都可以归类在作家作品推介和批评之中，进入40年代，研究有了新变。1924年的康拉德综论是民国海洋文学批评小热点，后来越来越多的文人参与康拉德批评，如在1931年梁遇春翻译的《青春》出版，他写有《Joseph Conrad》（《青春》译后记）；1935年在《文学时代》创刊号上，老舍发表《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1936年曼华写有《康拉德——现代作家之二十》（《华年》第5卷第42期）。除了康拉德外，域外其他海洋作家亦进入文学界人士的视野，文章有《海洋作家比野陆蒂》（《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从海洋文学说到拜伦，海贼及其他》（《南国周刊》1929年第5—8期）、《巴罗哈的海洋小说》（《小说月报》第22卷第1期，1931年）等。在40年代以前的民国海洋文学讨论中，没有学者专事理论建构，推介和批评是主流，个别学人的研究较为深入。而在抗日战争背景下，文人如蹇先艾、张毓后、柳无忌和徐迺蒙等更乐于从国家文学角度谈论海洋文学，这使得海洋文学讨论具有强烈的现实功利色彩；柳无忌更试图系统地论述海洋文学，标志着民国时期的海洋文学研究升级，自觉的海洋文学理论建构出现。

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民国海洋文学批评，在理论上有一定价值。首先，民国文人引进“海洋文学”类型，并就何为海洋文学作出了非专门的界定。民国文人大都认可海洋文学这一类型，在论述海洋文学时或不阐释该概念，或认为以海洋为题材的文学就是海洋文学，如有人指出康拉德“将其海上生活之所经历，如汹涌的波涛，剽忽的海盗，愚

昧的蛮人……等为题材，演作小说”^[25]。这显然不是严谨的学术概念界定。其次，民国文人赏析康拉德等作家的海洋文学作品，简述作品里海洋的自由、神秘、悲壮等美学品质，在海洋文学批评中，这是大多数文章述说的重点。最后，他们论说海洋文学如何发生，如波兰人康拉德怎样成为大英帝国的海洋作家。民国文人在康拉德批评中不厌其烦地阐述海上冒险经历在海洋小说写作中的重要性，强调海上生活在海洋文学发生中的意义。有的论者着眼于中西比较，从文学地理学角度读解海洋文学的发生，理论性较强，例如认为拜伦“得了他祖父航海家与游历家的气质，他更留有他远祖做斯堪的纳维亚海贼的血素，所以他渴慕着自由，天然地和那自由的海洋，有无限的恋情，因之，他有许多赞美海洋的灵句，也就吐出许多他毕生拥护自由反抗强暴的怀抱”^[26]。学者从诗人拜伦说到英美海洋作家，认为他们的先民是活跃在海上的民族，所以海洋在他们的文化基因里烙有印记；另一方面，该论者以为中国是大陆之邦，所以少见海洋文学作品。综上所述，在理论探讨上民国文人取得了成绩，但不大，如海洋文学概念界定即是随意的略说。

柳无忌自觉地阐释海洋文学的几个要点，其文论的出现标志着在中国文论史上一种文学新理论即海洋文学理论正式形成。柳无忌对海洋文学的作家作品如数家珍，在他的文本里解读的作家有拜伦、康拉德、库珀、斯蒂文森、辛基等，作品有《奥德赛》《古舟子咏》《鲁滨逊漂流记》《水仙号的黑水手》等。并且，他有意识地讨论几个问题。第一，柳无忌的海洋文学概念界定虽然不科学，却是自觉且专门的概念阐释。第二，他试图建构海洋美学。今天，在建设“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海洋美学的建构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随着中国文化的当代演进，海洋正在成为文化的重点，从而成为美学的重点，因而海洋审美成为文化演进的重要方面，就此而言，海洋美学只是把美学原理运用于海洋而已”^[27]。从学术史和理论价值看，柳无忌都是有意义的存在。在他之前，民国文人论析海洋文学的美学特质，通常局限于某个作家或作品，综合性研究少见，而柳无忌不仅论述海洋文学的美学特征，而且直接陈述海洋之美，并提及西方画家也善于描

摹海洋的美丽景致，因此，柳无忌可谓建构中国海洋美学的第一人。他的研究为当下中国海洋美学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当然其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即海洋美学的中国底蕴稀缺。第三，柳无忌深入地论述海洋文学的功能。他既重视海洋文学的审美功能，建构海洋美学，更推崇它的社会功能，期许海洋文学在国家型构中发挥重大作用，他的理论是审美功利主义理论。柳无忌在海洋文学的重要问题上进行了探究，建构了民国时期的海洋文学理论。

在柳无忌之后，民国时期还有其他文人讨论海洋文学，但他们在理论探讨上的收获不大，有人受柳无忌影响而研究海洋文学。如徐迺蒙有《建设海洋文学》（《长风文艺》第1卷第3期，1943年），义人翻译有《英国的海洋文学》（《中国周报》第129期，1944年），俞大綱有《海洋小说家斯摩拉特》（《学识杂志》第1卷第9期，1947年）等，但在海洋文学研究的深度和高度上，无人能及柳无忌。《英国的海洋文学》内容单一，仅仅指出近代英国在海洋冒险和扩张中获得优势，所以作家们创作了很多优秀海洋文学作品；在《海洋小说家斯摩拉特》中，俞大綱讲述斯摩拉特创作海洋小说的缘起、分析他的几部小说、评价他在英国海洋文学史上的地位，但在海洋文学理论上的创见不多；在柳无忌的影响下，徐迺蒙写有《建设海洋文学》，文中他一是呼应了柳无忌所提倡的海洋文学运动，二是重视海洋文学在国家存亡和建设方面的价值，他的见解在柳无忌的看法之下。如果再搜寻非文学期刊里的海洋文论资料，还能发现有其他人在论说海洋文学，如在1947年第2期的《中国海军》上有一则《海洋文学征稿小启》，该文对海洋文学概念的探讨并无新意，作者仍持“海洋题材说”。总之，民国时期在理论的探究上罕有超越柳无忌的后来者，因为在海洋文学方面的学养和研究的兴趣上几乎无人能与他媲美。

民国学人的海洋文论主要有四部分内容，即何为海洋文学、海洋文学如何发生、有哪些美学特征、有何功能。这些文论不乏亮点，但缺点也显而易见。其中柳无忌的理论最有价值。柳无忌的理论是力推国家向海洋发展的文学理论，比之民国时期其他人的此类文论，海洋美学含义尤其丰富，他所讨论的两个话题有超越时代的魅力。在第三届海洋

文学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跨学科视域下的海洋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从多元化视角进行了深入研讨，既为今后海洋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为‘蓝色诗学’(Blue Poetics)和‘海洋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建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28]。“蓝色诗学”和“海洋命运共同体”话语虽然是新主题，但话题并不新，当今学者关注它们，即是在无意中沿着柳无忌的道路进行有时代特色的学术拓展。在海洋美学建构方面，宁波大学王松林教授提出的“蓝色诗学”说包含尊重、敬畏海洋的意涵；进而言之，海洋生态美学的建构有良好前景，人与海洋、海洋社会里人与人的交流、对话以及他们的和谐相处，是理论建构的基本主题。“海洋命运共同体”话语建构是新的时代赋予研究者的任务，学者可以参与讨论，但不宜过于急切，否则，就会犯柳无忌犯过的错误，夸大海洋文学的社会功能。在关于海洋文学之发生的论述中，文学地理学方法被引入，这是有意义的学术尝试。不过，民国学者尚无确切的文学地理学概念，否则，在陆国作家的海洋旅行经历、作家海洋家园感受的获得和作品里海洋空间的情感价值取向等方面，他们的研究会更明晰，也会更加深入。文学地理学研究在当今是学术热点，现在的学人如果从文学地理视野研究海洋文学，必定能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民国学人的海洋文学概念阐释，如柳无忌等人的“题材说”在今天已缺少说服力，这种界定恰如韦勒克所言“这种划分法似乎仅根据题材的不同，这纯粹是一种社会学的分类法”^[29]。但参照民国学人的海洋文学论述，进一步界定海洋文学并不难，可以有较为完备的定义，即海洋文学是以海洋作为书写和审美对象且有一定海洋意识的文学。在以上四个方面，综合地看，柳无忌的理论相对而言高远且深刻，在中国海洋文论史上是重要的里程碑，对当今的理论建构而言参考价值最大。

民国出现海洋文学讨论热潮，应归因于特殊的背景，即国家从重陆轻海到重视海洋经略，民国文人呼应近代中国的大变局，引进域外海洋文学，展开批评与理论建构。作为文化和学术热点，海洋文学的推介、评论与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这种内在关联非民国独有。海洋文学研究在1949年以后很

长一段时期内的沉寂，原因是国家没有致力于海上发展的迫切愿景；而近年来，建设“海洋强国”是国家战略，海洋国家建设需要海洋文化软实力做相应支撑，海洋文学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当下，海洋文学成为热点。那么，被淹没在历史深处的民国海洋文学评论就有重要研究价值，民国文人的经验和教训能为当今所用。当前的学者在研究海洋文学时应继续持国际视野，广泛吸纳世界上先进的海洋文化，另一方面，须将中国海洋文学纳入研究范围以补救民国海洋文论的缺陷，赋予理论以丰富的中国元素。在理论建构中，民国学者虽在几个问题上展开了有深度的论说，但也留下了可以拓展的广阔领域，如海洋文学基本要素、海上人物跨文化对话、中西海洋文学比较等都是有新论题。对当今学人而言，话题不论新旧，均有深入研究的价值。海洋文学研究正逢好时机，当前的文学研究者如能效仿柳无忌，形成海洋文学研究的兴趣，海洋文学批评和理论建构必将迎来兴盛之日。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国海洋文学理论研究”(20YJA751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1] 王伟:《民国海洋文学史述略》,《文学研究》2015年第2期。
 [2] 王震中:《从华夏民族形成于中原论“何以中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3]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张品兴主编,第1545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4] 陈衍德:《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国家航海》第十辑,2015年。
 [5] 《李鸿章全集·第二册·奏稿》,唐小轩、栾兆鹏主编,第874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6] 宁一中:《康拉德学术史研究》,第170页,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7] 《文学研究会资料(上)》,贾植芳、苏兴良、刘裕莲等编,第509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8] 蹇先艾:《如何建海军文学》,《海军建设》第2卷第10

期,1942年。

- [9] 柳无忌:《守住教学岗位的一生》,见《教授·学者·诗人——柳无忌》,柳光辽、金建陵、殷安茹等编,第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0] 莫狄、勒樊脱:《英国文学史》,柳无忌、曹鸿昭译,第1页,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11] 陈国灿:《略谈江南文化的海洋特性》,《史学月刊》2013年第2期。
 [12] 柳光辽:《忆无忌舅舅》,见《教授·学者·诗人——柳无忌》,柳光辽、金建陵、殷安茹等编,第383页。
 [13][14][15][16][17][18][20] 柳无忌:《海洋文学论》,《海军建设》第2卷第12期,1942年。
 [19] 段汉武、陈慧婷:《海洋文学理论构建、经典阐释与国家型构——“第二届海洋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6期。
 [21] 佚名:《海军建设促进会第一次全体会员代表大会宣言》,《海军建设》第2卷第1期,1941年。
 [22] 李怡:《国家观念与民族情怀的龃龉——陈铨的文学追求及其历史命运》,《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
 [23] 《英美文学概观》,张越瑞编译,第101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24] 柳无忌:《西洋文学的研究》,第161页,大东书局1946年版。
 [25] 诵虞:《新近去世的海洋文学家——康拉特》,《文学》第134期,1924年8月11日。
 [26] 阎折梧:《从海洋文学说到拜伦,海贼,及其他》,《南国周刊》1929年第5—8期。
 [27] 张法:《怎样建构中国型海洋美学》,《求是学刊》2014年第3期。
 [28] 薛巧萍、段波:《“蓝色诗学”与“命运共同体”建构——第三届海洋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29]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新修订版),第230页,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责任编辑:高华鑫